



##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个性化

张康之

**摘要:**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个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构成的多样化、行动者的多元化等,都在客观上汇聚起一种个性化的力量。事实上,来自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以及面对危机事件的即时行动,都对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依规则而行构成了挑战,要求彰显个性。在人类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由于人的自我意识尚未生成,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个性追求。工业化实现的人的解放为个性化提供了契机,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走的是一条通过规则治理社会以及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确立起统一标准的道路,它使得人以及行动的个性化仍然是可以想望却不可企及的理想。20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显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个性化运动也处处弥漫开来。我们正在走进个性化的时代,对个性的承认和包容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 工业化;后工业化;标准化;个性化;家元共同体;族闾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3-0014-08

在 20 世纪后期,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开始变得非常强烈了,而且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启动了改革运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在提供部门的和标准化的服务方面,简单的金字塔形的等级体系是完全能够适应的;但是,一旦要在每一个层次上做出符合角色众多的、创造性伙伴关系的总体反应时,这个体系就无法适应了”<sup>①</sup>。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卡蓝默提出,“当今公共管理的关键和艺术不在于找到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精确平衡,而在于发现把同样性和多样性的双重需要协调到最佳状态的共同体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完美地满足人类的双重愿望,一方面是希望合作,与别人联合,把他们自己的短暂历史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另一方面是希望自己独有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和尊重”<sup>②</sup>。事实上,来自社会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如果不考虑到需要的多样化,而只停留在原先那种服务供给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就无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使“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精确平衡”变得更加不可能了,因而也使卡蓝默构想的新模式有了探索的紧迫性。这种新模式以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整个社会治理的个性化为基本特征,每一个行动者都有着明显而突出的个性,同时,又处在一个合作体系之中,以其个性在合作治理中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位置,又通过合作使个性的价值最大化。

### 一、历史走向中的个性化

在人类历史的农业社会阶段,人存在于家元共同体之中。家元共同体是同质性的,人

<sup>①</sup>皮埃尔·卡蓝默,安德烈·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4.

<sup>②</sup>皮埃尔·卡蓝默,安德烈·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6.

在这种共同体之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在生物学意义上,人是独立的自然存在物,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人则被消融于共同体之中。因而,人并不是个性化的存在物。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或在特定的人群中才会有一些人要求张扬其个性。即便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追求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也是作为类的理想出现的。正是因为对个性的追求是一种理想,才为人类社会走向个性化的方向提供了初始动力。

总的说来,农业社会的人尚未生成自我意识,并未通过思想和理论去关注人的个性化问题,只有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才存在着一些用不合乎常理的行为去宣示个性的做法。对此,人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些放荡不羁的人,是不被社会接纳的。当然,农业社会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和活动,以至于让人们以为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类似于工业生产的因素。比如,人们可能会在农业社会的艺术生产中看到工业化的影子,其中中国农业社会的年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因为“年”的习俗,每年对年画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量都是很大的。但是,就年画而言,这种每一件作品都必须经由手工而不是机器制作的情况,在本质上并不是工业化的,即使普通的消费者在选购时也会逐件进行比较,准确地发现适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与之不同,在工业社会,工业化的艺术品生产,使得艺术消费过程中进行选购和鉴赏变得没有必要。因为艺术成了失去实质性内容的某种形式,只要能给人的感官带来第一印象的刺激就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在同一作品可以被大量复制的时候,也就同时通过这种复制把人的审美感官驯化成同样的品味和同样的审美需求;至于对不同作品的复制品的偏好,也与人们对日常消费的工业品的偏好一样,同属于那种品味和审美需求。在这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性都被完全消蚀掉了。迄今为止,艺术一直是被作为个性化最为突出的领域看待的,我们举艺术为例更能够说明,自工业化以来个性因受到了标准化的压制和冲击而成了理论追求中的奢侈品。

应当承认,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当人们从等级关系中挣脱出来,当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走出了同质性的家元共同体后,获得了解放的感觉,从而为人走向个性化的方向提供了某种希望。但与此同时,人又被投入到了组织之中。一旦人们进入组织,“作为组织成员,作为系统成员,被包容的个体必须服从金钱和行政权力等控制媒介。这些媒介实施一种行为控制,一方面导致个性化,因为它依赖个体的选择偏向;另一方面又导致规范化,因为它只允许在事先已经给定的范围(如有或没有、命令或服从)内进行选择”<sup>①</sup>。结果,人并未从解放中获得自由,反而陷入更加严密的无处不在的控制之中。工业社会崇尚的是法治,主要是通过规则实现控制。由于规则是建立在抹平人的差异的基础上的,是基于统一性而制定的人的行为标准,因而把人的个性全部消解了。

我们说农业社会是以家元共同体<sup>②</sup>的形式出现的,是说这个社会也可以看作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因为拥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而获得同质性。而且,在这种同质性的基础上,即便是一个人独处或独自开展活动,也会严格地将自己的行为放在共同体的规范调控之下,不会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而作出对共同体规范挑衅的举动。工业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因为人们之间的陌生人关系而使每个人都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出现。尽管陌生人也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但共同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用一种族闾共同体<sup>③</sup>替代了家元共同体。族闾共同体是人们通过契约的中介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而不像家元共同体那样是在社会的自然演化中生成的。所以,在族闾共同体中,人因为通过中介因素与共同体发生联系而得以保留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但是,我们也需看到,人的这种独立性是一种虚假的独立性,即不是人的个性。由于个体的人在形式上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其群集状态也是可以单单进行量的描述的,所以,这种原子化的个人并不是个性化的个人。

尽管如此,在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中,特别是在心理学的观察中,可以发现陌生人社会中的个人有着某种孤独感,并有一些错误的解读会将人的孤独感与人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其实,人的孤独感不仅不是

①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17。

② 家元共同体指以家为基本单元并通过家的一层层扩散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参见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③ 族闾共同体指与家元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相并列的以族群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政治共同体。参见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由人的个性的体现或因人的个性所引发的,反而恰恰是因为人的个性受到了剥夺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是因为人失去了自我却又保留了自我意识,才会强烈地感受到孤独。所以,人的孤独感表面看来是个人的心理现象,实际上则有着社会根源,是由于社会压制了个性、剥夺了个性而在人心里投下了阴影。人的孤独感在工业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导致了抑郁症患者大量增长。可以认为,工业社会是找不到消除人的孤独感的途径的,只有当人类社会告别了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我们根据人类社会这一新阶段的人的关系和行为特征将其称为合作的社会。我们相信,一旦人类进入合作的社会,人的个性与自我意识将不再分离,而是在合作行动中得到凝聚,在自我意识的支持下自觉地表现个性,因而,也就不再会生出孤独感。

从服饰以及人在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行为就可以看到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在农业社会,人们会刻意掩饰自己与众不同的各个方面,会尽可能地在服饰上与他人保持一致,张扬个性的任何一种表现都会使人陷入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中。同样,在工业社会,特别是从生产线中生产出来的商品,让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习惯于千篇一律。然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人的个性化需求正在对生产部门施加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迫使生产部门以多样化的产品去迎合人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再需要在与他人的一致中去谋求安全感,而是需要通过张扬个性去获得成功的机会。作为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心理防御机制已经被抛弃,通过张扬个性而追求卓越的社会机制正在生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控制模式把人们置于相同格式中的做法,显然与时代的节拍不合。所以,为了尊重人的个性,政府也必须定位在服务的角色上。

对生产而言,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生产者数量的增加,为了使多个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达到同一要求,就必须制定相关标准。反过来,也因为运用标准,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和生产者数量的可无限增多。进而,标准被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的行为发挥调节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法治的理念中就包含着同一标准的设定,依法治理实际上也就是对作为标准的法律的应用。所以,工业社会就是一个崇尚标准和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实现了标准化的社会。就工业社会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言,应当肯定标准是一个表现非凡的工具。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标准化的追求受到了个性化的冲击。其实,20世纪后期,社会活动的内容开始从以生产为重心转向以服务为重心,从中就可以看到标准化的合理性正在丧失。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更是宣示了标准化的不可能性。尽管在服务业的发展中,人们也试图为内容相同的服务制定标准,而就服务业的总体来看,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由此可见,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活动将凸显个性化的特征。也许在生产的意义上仍然会保留下来诸多需要通过标准来规范和调节的事项,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标准化的去势已成必然。

## 二、组织的同形化与个性化

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开始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学校、研发部门和政府官僚机构等组织,运用各种不同的、模糊的、矛盾的技术,来生产和提供其产出,其产出的价值难以评估。而其他具有确定技术的组织,突然发现自己已不能应对环境中出现的变动。一个组织仅仅提高其生产绩效,并不能解决不可预测的技术偶然性和环境变迁的不确定性”<sup>①</sup>。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既有模式的组织与新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需要通过组织的个性化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罗恩说的这两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就是同一模式的不同组织会发展出不同的方法和技术,会随时根据组织运行的需要去改变方法和技术,既显现出了组织创新,又显得能够适应具体环境和任务的要求。这在工业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中,都是对组织的一种较高要求,往往会在人们的评价中将其与理想的样板组织联系在一起。可是,这种组织在20世纪后期却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也就是说,组织如果在模式上不能显现出个性化的特

<sup>①</sup> 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鲍威尔,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9.

征,仅仅在方法和技术上求新求异是无法与时俱进的。至于第二种情况,即组织既在模式上表现了同形化,又在方法和技术上不思变革,更会与新时代的要求不合拍。所以,组织必须认识到个性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趋势,只有在对个性化的追求中,才能赢得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农业社会只在很少的领域中出现了组织化的社会活动,而在工业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组织的形式进行的,或者说,“社会”一词本身就意味着组织化的活动和生活过程。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元是“家”的话,那么组织则构成了工业社会的细胞。这个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也是组织活动的空间。当我们谈论社会时,是将其作为一个非常模糊的形态或观念看待的,如果希望了解社会的具体存在形态及其过程的话,就需要将视线放在组织之上。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去认识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社会中的众多组织处在一种同形化与个性化的牵扯之中。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组织的同形化与个性化这样两股力量推动的。

组织理论家们对组织同形化的问题是这样认识的,“同形是一个限制性过程,迫使组织人口群体中的一个单元与其他的面临同一环境条件下的单元相似。在组织人口群体层次上,这样一种方式表明组织的特征被日益修正、调整并与环境的特征相一致。一个组织人口群体的组织数量,取决于组织环境承载力;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是与环境的多样性相一致的”<sup>①</sup>。竞争环境可以激发组织的学习冲动,每一个组织都会将进入竞争场域的其他组织作为学习的对象,即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制胜的技能。这是组织同形化的动力。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浅显的道理:组织仅仅向对手学习还不能获得制胜对手的能力,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发现制胜对手的路径。所以,竞争的环境也赋予了组织创新的冲动。可是,由于组织共处同一个竞争性的场域,每一组织都以制胜对手为目标,因而,在它们之间有着各自保守自我秘密的需要。而且,这种保守秘密既是以自我封闭为前提的,也会导致自我封闭的结果。这样一来,组织间的学习也仅仅使它们在外在表现上同形化,比如在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实现同形化,而在其他实质性的方面却无法趋同。同样,组织的创新是组织个性化的动力,但每个组织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只能进行独自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较低层次的。由于组织之间共有的知识系统所限,它们的创新往往是低层次的重复发明,不能在社会的意义上促进组织各个方面取得进步。这就是工业社会组织同形化与个性化的基本情况。

官僚制理论的提出,一方面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普遍性、统一性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业社会组织同形化要求的一种反映,是关于同形化的组织统一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理论概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官僚制要求祛除价值巫魅、非人格化。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运行,官僚制的祛除价值巫魅和非人格化都使得组织可以通过严格的安排去避免组织中人或群体的冲突。即使存在或出现了这些冲突,也会从组织的分工—协作程序等方面的合理性入手去分析和解决,通过一些改革和调整措施去营造一种机械性的和谐状态。然而,根据诸多实证研究,组织中如果存在可控的人际冲突、群体冲突,是有助于组织整体绩效的。因为这些冲突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组织拥有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反过来,这些冲突又能促进竞争,使组织获得更大的活力。这反映了官僚制组织的双重性,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严密的规则、科学的结构和合理性的程序都是出于抑制人性之恶的需要和要达到防范竞争的目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依照统一的规则、格式化的程序、严密的制度去实施对组织的管理。因而,也就同时消除了组织中一切因素的个性,使组织不再成为有个性的体系。另一方面,竞争又客观地存在于组织之中,并以人际冲突和群体冲突的形式出现,在可控的条件下还发挥了增进组织绩效的正向效果。所以,组织又会保留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以便有序的竞争能够进行;在竞争的维度中,使组织要素在个性化的维度上生成和增强。正是组织的这种矛盾状况,决定了官僚制组织必须在组织内部实现“抑制人性之恶”和“促进竞争”之间的平衡。到了20世纪后期,由于“绩效管理”概念的提出,组织——特别是私人部门组织——的管理者也开始自觉利用组织中的这些冲突,甚至会主动地去激活这些冲突。这显然

<sup>①</sup>迪马吉奥,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鲍威尔,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1.

是对人性恶的一面的利用。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这种对人性之恶的利用在社会层面促进了组织的个性化。不过,“标杆管理”的概念又引导着人们走向组织同形化的方向。

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控制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安排都是可能的,也都能取得合目的性的结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工业社会中的组织存在着组织本位主义的取向,也需要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安排去实现组织目标,无论是防范人性之恶还是利用人性之恶,在提升组织绩效的过程中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们从中也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安排都是建立在组织封闭性前提下的。只有在组织是相对封闭的时候,才能将其打造成一个控制体系,才能防范人性之恶的消极影响,也才能既控制又利用人际冲突和群体冲突。然而,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组织已经无法成为封闭性体系,组织本位主义也丧失了合理性,组织利益因此而不被承认,从而走向消失。事实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是充分开放的组织,无论防范还是利用人性之恶,都失去了赖以实施的基础。特别是当我们将视线转向组织外部的时候,组织的系统开放性决定了无论是对人性之恶的抑制还是利用,都不可能在组织自身管理的强化中得以实现,而是需要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去谋求组织的社会定位。这个时候,组织在社会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将为“他在性”所替代,组织意识形态上的利己还是利他问题将被人的共生共在所消解。结果是上述组织管理中的平衡技巧也就失去了可以应用的场所。就是说,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将生成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即使官僚制组织还会在某些社会事项上发挥作用,也不再是基础性的组织形式,而且,也会受到合作制组织的熏染和改造,会显现出一定的个性化特征。

我们认为,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合作制组织将不会围绕防范还是利用人性之恶的问题做出安排和开展行动。首先,合作制组织因为彻底抛弃了组织本位主义和放弃了对组织利益的关注而使防范或利用人性之恶变得没有意义。事实上,合作制组织根本就不会承袭人性恶的假定,更不会对人性恶做出验证,而是把可以组织和调动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处理有益于人的共生共在的具体事务上。其次,合作制组织因其充分的开放性而从根本上消解了组织中人际和群体冲突的基础。不难想象,开放性必然意味着流动性,人们无需固定在某一处等待和接受邻近的人或群体与他发生冲突。而且,合作制组织的合作属性也决定了他们为了解决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合作,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会导致工业社会的那种为了自我而开展的竞争和冲突。第三,就合作制组织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适应性组织而言,会随机性地因情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合作制组织之间也处在广泛的合作关系之中,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管理的意义上去建立刚性设置,除了为组织成员确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之外,不会去强化管理上的设置。而且,它将完全告别以往组织的控制导向,也会因此而不再可能生成防范还是利用人性之恶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合作制组织不存在同形化的要求,因而是最具有个性化的组织。

合作制组织必然是开放性的组织,而且,它的开放性是建立在专业性个性基础上的。组织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关系决定了组织学习并不导向同形化,反而,组织创新成果会迅速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创新成果,其他组织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接受,或者说,组织专业性的个性化决定了它无法简单地学习、接受和模仿某个组织的既有成果,而只能以某个组织的创新成果为参照或在某个组织既有的创新成果基础上去进行自我创新。这样一来,创新行为就会普遍化,创新效应也会呈几何级数放大。即使是那些需要推广和进入生产过程的创新成果,也不会像工业社会那样是无限复制、模仿和精确再生产的,而是一系列个性化的再创新成果。

即便是在工业社会也可以看到,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如果组织的需求是特殊的,它就没有与其他组织争夺外部支持的问题,它只要把着力点放在稳定外部支持来源方面就可以了。也可努力协助外部支持的来源去做一些改善工作,力求这种外部支持在效率和质量上都能得到稳步的提升。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合作制组织显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个性化。合作制组织的个性化特征也会表现在组织需求的特殊性上,一般说来,它对外部支持的特殊需求促使它与环境之间建立起

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制组织对多元外部支持的需求只是它与多个外部支持来源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的树状展开,就它对每一种外部支持的需求来看,都是特殊的,都需要个性化服务来满足它多向度的需求。因而,合作制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合作和互动也是多向度展开的。

总体看来,在 20 世纪后期,无论在生产、服务还是社会治理领域,组织的工艺和流程等都在不断地变化,组织之间的差异以及个性化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一些学者甚至对这种现象作出过度解读,认为它代表了某种变革。其实,官僚制组织的基本框架并未突破,这些变化仅仅属于工艺或流程方面的变化,虽然也在功能上有诸多优异表现,但与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要求之间还有着巨大差距。可以认为,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组织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要求,仅仅在工艺和流程方面进行调整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而是需要用合作制组织替代官僚制组织。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是为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复杂性需要而出现的,组织结构为了满足复杂性的需要而具有多样性,而且与以往的组织相比更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在单个组织这里,组织的多样性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个性。

### 三、从标准化到个性化

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体活动中,自觉建构起来的规则在性质上应当被理解成标准,在功能上表现出来的是规范作用。其实,就汉语中的“规则”一词来看,“规”字本身就是指标准,而“则”字所指的就是“规”的功能和所应发挥的作用,是“范”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要从“规则”的本义中解读出一种思路。既然规则意味着标准,是由人自觉建构起来的,就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标准的适用性。这样一来,就不单纯是一个规则宽严的问题了。当我们关注规则的宽严问题时,是针对其功能而做出的审视,一旦我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规则的适用性问题上,所需审查的主要就是规则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客观要求的问题。那样的话,就必须在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诸种条件下去认识我们所制定的标准。

如果我们制定的标准综合性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诸种条件,肯定在适用性方面是很强的,相反,是没有什么适用性的。对于缺乏适用性的规则,如果因某种强力的推行而使其功能得到实现的话,对社会生活和群体行动产生的就是非常消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依靠什么去保证制定的标准综合性地而且正确地反映了那些应当作为依据的因素呢?这完全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我们既已拥有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无法保证规范人的行为的标准在正确反映客观条件及其要求方面是清楚明白的,所以几乎所有的规则在被制定出来的时候都仅仅从属于一种模糊性的原则。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谈及规则的学术作品都只能从功能的角度去审查和评判规则,而不是采取科学的客观性立场。这不是说所有关于规则的研究和探讨都错了,而是说,虽然规则成为现代法治的核心构成部分,但对现代科学探讨而言却是一个禁区,人们往往拒绝对它进行认识论的科学审查。上述已经指出,制定出来的规则是被作为行为标准对待的,这些标准无论以法律还是以组织规章的文本出现的时候,都是非常清楚和确定的,但它们的依据却是模糊的。这不能不说是工业社会的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归结起来,工业社会是在标准化追求中走向了时时处处对规则的依赖,在规则的应用中则压制和消解了个性,从而导致一切社会建构都在科学的意义上产生了悖理的状况。

既然规则从属于功能意义上的审查而拒绝科学意义上的判断,也就把我们导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在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背景、环境、条件等都非常简单以及它们的关系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往往不会产生对规则的需求;当所有这些方面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尽管制定规则的依据是模糊的,但在规则被制定出来并发挥作用的时候,却能够把人的行为矫正或框定在某种模式上,而且这种模式与背景、环境、条件间的关系是融洽的,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也表现出了合意性,同时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在功能的角度上去加以验证,结果也就会认定规则的合理性。最为重要的是,证明了标准化追求是可行的,以至于人们形成了对标准化做法的信仰和路径依赖。不过,一旦我们基于上述推理再前行一步的话,就会看到,

假设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背景、环境、条件以及它们的关系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无从做出一般性的判断和把握时,制定规则所需要的模糊依据也就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从功能的角度对规则进行审查和评价也会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了。当人类步入21世纪后,我们的社会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规则的规范功能也已经呈现出弱化的情景。

就20世纪后期政府放缓规制的改革行动而言,也许其中包含着一个判断,那就是繁杂的规则系统使社会失去了活力。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事项都有了标准的时候,标准成了束缚人行动的绳索,而且,标准以及规则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今天看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已经变成非常严重的束缚人行动手脚的因素,以至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时也可能碍于规则而无法做出随机应对。所以,即使从功能的角度去审查和评价规则,也把我们导向了对规则的怀疑。我们认为,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为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制定和确立同一性和普遍性标准的做法已经不可行了,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其他规范去替代规则。

当然,如果说规则不是由社会中的权威部门或群体中的权威持有者制定的,而是生成于社会生活和群体活动的默契中,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也许在人们的共同生活和行动中因默契而生成的规范不能再被称为规则了,但如果我们仍然将那种东西称为规则的话,它(们)将不是明确的标准。它(们)在形式上即外显的形态上将是模糊的,而在意会于心的时候又是清晰的。这样的话,规则将生成和存在于较小的社会生活圈子中,或者说,生成和存在于具体的集体行动过程中,而且处在不断变动中。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成规则的个性化。总之,一个社会共享的普遍性的规则将会走向消失,即便存在着这种普遍性的规则,也只能说是一些基本原则,具有很大的弹性和解释空间,而不是以刚性标准的面目出现。虽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的无界流动会呈现出高频特征,但就规则而言,却会呈现出“地方化”的趋势,即生成和存在于特定的人群和具体的行动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把这种地方化也看作是个性化的话是没有什么不妥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将会有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理念——人的共生共存,一切行动都被要求在这一理念下展开并从属于这一理念,但规范人行为的规则都将呈现出“地方主义”的状况。

哈伊因认为,“行政管理主要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沟通的手段,所以,对行政管理进行改进,就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更有效的对话,从而使人民能真正参与国家发展……在各类传统的社会中,人们的广泛接触往往比交流的内容更为重要;信息的价值和作用,无论其具体的含义如何,若缺乏最终的感情接触和人情色彩,就会大打折扣,即便是面向所有人的信息,也应让每个接受者产生个别交流的印象”<sup>①</sup>。然而,建立在普遍性和同一性哲学理念上的官僚制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在工业社会的个体中心主义氛围中受到了标准化的压抑而无法成长起来。因此,哈伊因对体现了标准化管理表达了反感。现在,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人的个性化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个性追求以及希望得到具体关怀的需要都成了不得不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会让人们对于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上的形式化的行政管理投来反感。一旦行政管理面对公众的反感和对立情绪时,无论行政目标设计得多么好,都会在实现的过程中变得困难重重。如果后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关键进展的话,那么社会就会发生总体性结构变革,会导致既有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及其技术都不再适应。当然,哈伊因在行政生态学的误导下所畅想的行政管理针对对象的情感化将不会出现,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业社会行政管理状况的留恋,但是可以确信,政府过程和行动上的个性化必然是后工业化进程中加以刻意建构的事项。

在近代300多年的工业社会建构中,标准化可以说是一项最具基础性的追求。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而言,标准化是经济协调的基础性路径;对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而言,标准化通过给予人们一

<sup>①</sup>史光远,成文德,陈宽,等编译.公共行政管理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问题.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4.

些基准性的尺度而获得政治以及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对组织行为而言，标准化使差异万千的组织成员拥有了同一行动依据……标准化是工业文明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法的精神以及组织纪律都通过标准化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标准化的追求出现了逆转的趋势，现今人们感受到的是个性化追求对标准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对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赞赏，都在社会生活的每一项积极行动中向标准化表达一个“不”字。

我们看到，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看，工业社会拥有的是简单形态的科学技术。简单的科学追求标准化，低级的技术则以标准化为其自身实现的最高境界。可以想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将会转向对复杂性的关注，而技术则必然会要求以个性化来证明自身的发展水平。这可以用团队研究中的一项发现来证明我们关于科学技术未来的关切点是一个可信的判断。根据贝尔宾的研究，团体要求标准化的模式与之相伴，而团队则鼓励多样性。那是因为，“团体心理学不像团队那样强调在合作中各人角色的不同，它只是高树共同行动的大旗”<sup>①</sup>。从与后工业化相伴的全球化运动看，人的流动和民族国家边界的消解造就了文化多元化的生活空间。在文化多元化的条件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人类社会共享的基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和包容，从而使人们不会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再次凝聚起同质性共同体，也不会在文化转化为规则的时候使人丧失个性。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和包容会要求人突出个性，是以自我个性的持存而去承认和包容他人的个性。

## The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ZHANG Kangzh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mean the arrival of an era of individualiza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osition, the diversity of actors, etc., are objectively accumulated into an individual force. In fact, the diverse needs of society and immediate actions in the face of crisis posed challenges to industrial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its standardization and rule-based approach. Obviously, what they require is individuation. In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re is no universality of individual pursuit because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has not yet been genera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for individua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it has paved a road of governing society through rules and establishing a unified standard in each field of social life. Eventually,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human and the action is still an ideal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distance but unattainable.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with the society to show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and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 individualized movement also spreads out everywhe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are entering the era of individualization, the recognition and tolerance of personality should be the main theme of our times.

**Key words:** post-industrialization; individuation; standard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family-community; clan-community

● 收稿日期：2017-01-19

● 作者地址：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Email: kzzhang@ruc.edu.cn

●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12XNL003)

● 责任编辑：涂文迁

<sup>①</sup> 梅雷迪思·贝尔宾. 超越团队. 李丽林,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 22.